

许纪霖 著

大时代中的 知識人

(增订本)

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图景

本书入选《深圳商报》“2007年度十大好书”，荣膺第四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



中华书局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增订本)

许纪霖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许纪霖著. - 增订本. - 北京:中华书局, 2012. 11

ISBN 978 - 7 - 101 - 08706 - 2

I. 大… II. 许… III. 知识分子 - 人物研究 - 中国 - 近现代 IV. K8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1535 号

书 名	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增订本)
著 者	许纪霖
责任编辑	马 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8 插页 2 字数 450 千字
印 数	1 - 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706 - 2
定 价	50.00 元

目

录



第一编 中国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

-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 3
- 入世与出世——进退维谷的两难困境 / 17
- 外圆与内方——现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 31
- 超然与介入——东西方知识分子比较与其他 / 46
- 重建社会重心——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社会 / 54
- “少数人的责任”——知识分子的士大夫意识 / 82
- 20 世纪中国六代知识分子 / 119
- 都市空间视野中的知识分子 / 124

第二编 大时代中的蜕变与坚守

- 曾国藩：中国式的入世禁欲 / 143
- 黄远生：忏悔中的精神升华 / 150
- 胡 适：新观念背后的旧魂灵 / 160
 - 社会改造中的理性贫困 / 168
 - 中国自由主义的乌托邦 / 181
- 梁漱溟：狂出真性情 / 196
 - 最后一个儒家 / 201
 - 文化民族主义者的心路历程 / 211
- 林同济：紧张而丰富的心灵 / 222

第三编 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

- 周作人：现代隐士的一幕悲剧 / 241
翁文灏：一个科学家的错位 / 254
蒋廷黻：瓷器店中的猛牛 / 259
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 267
陈布雷：“道”与“势”之间的挣扎 / 276
傅斯年：一代豪杰傅大炮 / 290
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 / 296

第四编 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

-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 305
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 / 316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 / 338
吴 晗：可怜一觉开封梦 / 361

第五编 当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求索

- 张中晓：思想史上的又一位先知 / 371
顾 城：在诗意与残忍之间 / 379
史铁生：另一种理想主义 / 386
王小波：他思故他在 / 393
李慎之：最后的士大夫，最后的豪杰 / 404
王元化：“我是十九世纪之子” / 417

附 录

- 在刺猬与狐狸之间——我的知识分子研究之路 / 428

后记 / 442

增订本后记 / 445

第一编

中国知识分子的宏观图景

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历史考察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在比较中西文化,探讨中国封建社会何以如此漫长时,在不同的层次和程度上都触及了中国知识分子特殊性这一问题。令人深思的是,有众多研究者都提到了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分析这一现象不啻为了解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条路径。为何传统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又在多大程度上继承了自己前辈的人格遗产?

一

所谓近代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蕴涵着哲学、伦理、心理、历史和政治的多元内涵。以本文所涉及的历史—政治角度而言,主要指个体的自主性和社会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即表现为不依傍任何外在的精神权威,不依附于任何现实的政治势力;在真理的认同上具有独立的价值判断能力,并依据内心准则自由行动;在社会实践生活中,积极地参与政治,成为改造社会的独立批判力量。显然,这样的独立人格在传统中国知识分子身上极为匮乏,相反地倒表现出另一种人格形象:依附人格。即在思想上依傍古人,拘泥经典,在政治上热衷仕途,委身皇权。

传统中国知识分子依附人格的形成与传统中国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有着不可分离的互应关系。知识分子在古代通常被称为士。士阶层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正在形成中的大一统封建王朝中,它充当了沟通意识形态结构和政治结构

并加以耦合的超级组织力量,从而实现了“一体化”。另一方面,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与大一统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同构效应,形成了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特殊性:宗法一体化结构。士阶层既然在此结构中执行着组织联系的社会功能,那么功能反过来影响主体的结构,塑造出适应这种功能的依附人格。

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宗法一体化结构是如何通过儒家学说、科举制度和宗法纲常这三张大网将知识分子的身心紧紧笼罩起来,使之成为黏附于官僚政治的人格化的工具。

第一张大网:“定为一尊”的儒家经典学说。

大一统社会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高度一元化。唯有如此,才能用统一的思想模式将千百万读书人造就为定型化的国家官僚,依据共同的国家学说和伦理原则,实现对整个社会生活的管理。在先秦不过是诸子百家中一家的儒学,之所以在汉武帝后独得统治者青睐,被奉为神圣不可冒犯的封建经典,奥妙之一就在于它有助于陶铸大一统所需要的依附人格。

儒家思想就其政治内容来说是一入世哲学。孔孟都主张知识分子从政,他们本人亦身体力行,一再表示有用世之志。“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①孟子曾自夸:“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②在孔孟的职业价值观中,“治人”是上乘的大道,是劳心者士人的事业;“治物”是下乘的小术,是劳力者小民的本分。孔子曾责骂请求“学稼”、“学为圃”的学生樊迟为没有出息的“小人”,孟子更直言不讳:“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③由士而仕,由“修身齐家”进而“治国平天下”,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这是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在这样的人格理想感召下,多少传统士子拥挤在“学而优则仕”的狭窄通道上,胸怀为帝王之师的抱负,孜孜于漫漫仕途,乐此不疲,终生不倦。

儒家思想就其思维方式来看又是一泥古学说。犹如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一样,“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想方式”^④,以“圣贤”为追求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干”即入仕之意,“七十余君”乃夸张之词,孔子实际上周游六国。

② 《孟子·公孙丑下》。

③ 《孟子·滕文公下》。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2页。

目标的偶像崇拜,以“六经”(宋以后为“四书”)为文化正宗的理论原则和以“三代”为尊天法古的理想世界,构成儒家独特的“三位一体”思维模式。即令是被奉为“圣人”的孔子本人,也一再强调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①。这使后儒们更加诚惶诚恐,不敢越古贤的雷池一步。明初著名理学家薛瑄就说:“夫以孔子之大圣,犹述而不作,是故学不述圣贤之言,而欲创立己说,可乎?”^②几千年来,咀嚼儒家经典,师承前人陈说,通经明义致用,耗费了学人一生光阴和全部心血。代圣人立言,成为传统士子治学的唯一要旨。在思维的空间里到处充塞着如此陈腐的古贤之言,哪里还有独立思考、自由发挥的半寸余地!

通过上述两条原则,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分子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自觉地养成了政治上委身皇权、思想上依傍古人的依附人格。

第二张大网:为“防反侧”的科举取士制度。

与儒家精神相表里的,是隋唐以来逐渐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③。历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精力办科举考试,甚至皇帝亲登殿堂主持殿试,乃欲达到一箭双雕之目的:一是为封建官僚机器网罗人才,不断从社会上汲取新鲜血液,以保持国家机器的适当活力和官僚队伍的自然更新。二是唐太宗的使“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之术。正如清人冯桂芬引前人之语所说:“三年一科,今科失而来科得,一科复一科,转瞬其人已老,不能为我患,而明祖之愿毕矣。意在败坏天下之才,非欲造天下之才。”^④如此取士,岂止使天下英雄只求仕途得志,无暇他顾,更要紧的是使所有士子的思想都纳入钦定的标准模式,扼杀其个性和异端念头于萌芽之中。

为吸引士子们参加科举,政府不惜以功名利禄诱之。一日中举,便享有异于庶民的种种优待,俨然是一社会特殊阶级。清贫布衣和高官厚禄之间的选择是如此的严峻,以致很少有人能在名利的诱惑面前无动于衷。唐宋以来,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唯有登科入仕方是正途的价值观:“无论文武,总以科甲为重,谓之正途;

① 《论语·述而篇》。

② 薛瑄:《读书续录》卷四。

③ 在此之前的汉代察举制度,魏晋九品中正制度同样具有类似的功能。不过隋唐的科举制度较之更为完备、成熟,无论是豪门贵胄,还是清贫士子,均可机会均等地网罗其中。

④ 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变科举议》。

否则胸藏韬略,学贯天人,皆目为异路。”^①读书为登科、入仕,这种庸俗学风势必造成读书人只读经书,无心旁览,更不可能“舍圣人之经典、先儒之注疏与前代之史不读,而读其所谓时文”^②。目光是如此的短浅,知识是如此的孤陋,又怎么能够指望他们有开放的心灵,敏锐的思考,步入官场后勇于进取、有所开拓呢?

在科举制度下,全国公私学校皆以教人科举入仕为宗旨。政府官学“考其学业,科举之外无他业也;窥其志虑,求取功名之外无他志也”^③。以自由讲学标榜的私人书院,受政府多方掣肘,且抵挡不住科举的冲击,几经盛衰;至明末已分下科举名额,沦为科举的附庸,到清朝已与官学区别甚微,至于家塾、教馆,更是应付科举的预备场所。知识分子除科举入仕之外,几无栖身之地。在传统的中国,一个士子的职业去向无非上、中、下三途。上途乃登科入仕,这是梦寐以求的理想境界;中途是为权贵充当幕僚,已是不得已而为之;末途是设馆授徒执教,更有怀才不遇之叹了。无论是荣登庙堂还是屈居乡间,其所作所为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附于、服务于封建官僚政治,离开了后者简直犹如失业。

第三张大网:封建宗法的伦理政治关系。

在传统中国,封建等级制度与宗法家族制度交织一体,在社会关系中形成一张宗法性的伦理政治关系网络,它体现在观念形态上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三纲五常说。每个传统知识分子就像这偌大网络中的一个网结,不得不附丽于各种关系而生存,与上下、前后、左右结成须臾不可离之的联系。在家要孝敬父母,求学要服从先生,做官要尽心忠君,以至告老还乡还得对家族和地方履行一个绅士的义务。很少有人能够在行动和意识上冲决这个宗法伦理政治网络以及与此相应的纲常观念。在知识分子中间弥漫着浓郁的人情世故庸俗气息,关系学成为安身立命的处世秘方。“所以中国一向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④。

由此可见,在宗法一体化的社会结构中,由于这三张大网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职业高度单一化,经济上、政治上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而在

① 李东沅:《论考试》,见葛士浚编《经世文续编》卷一二〇。

② 顾炎武:《生员论略》,见《日知录集释》卷十七。

③ 汤成烈:《学校篇·上》,见盛康编《经世文续编》卷六五。

④ 鲁迅:《这个与那个》,《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12页。

意识形态领域中也从未获得过真正的思想自由、表现过锐意创新的精神。在古代词林中,士、儒生、士大夫三词意义相近,便形象地说明了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职业单一化和思想一统化的状况。因而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表现出近代意义上的人格独立性,只能是丧失了自我意识的、为皇权政治所异化了的依附人格。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上述这三张大网不仅仅是一种观念形态或世俗形态,它们的存在是以国家政权为基础的,其功能的发挥又是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的。谁如果想稍稍偏离正统,试图表现出某种独立的愿望,或者对异化的反抗,都会被看做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挑战,从而付出血的代价。明末李贽、何心隐的被戕害,东林党、复社的被镇压,清代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狱”——尽管牺牲者离近代的独立人格相去甚远,但他们的结局已足使大多数士子望而生畏了。在“刀与火”的历史中,在血腥的淫威中,所造成的大半是被泯灭了个性的奴隶或被扭曲了人性的奴才。

当然,在封建士大夫中不仅充斥着大量匍匐在皇权脚下的奴才,也有一些胸图大志、敢于直谏的儒家理想主义者。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政治,体现出某种个体的自主性、能动性和进取性。像魏徵、柳宗元、范仲淹、王安石、海瑞等人确乎有一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浩然正气,但这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独立人格,缺乏近代的气息。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著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凛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

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欲摆脱对大一统皇权政治的依附关系,只有两个途径:一是投奔绿林,加入农民起义的队伍;二是遁迹山林,当以庄禅自娱的山人隐士。但这两途是否真的导向人格的独立,解脱依附之苦,似大可怀疑。投奔“揭竿而起”者,如张良、魏徵、李岩之辈,尽管与现实封建朝廷斩断了关系,但是他们却未必与观念中的封建秩序分手;他们脱离了一个昏庸的暴君,却依附于另一个改朝换代的“真龙天子”,为后者出谋划策,运筹帷幄。因此,与其说他们是宗法一体化结构的异己,不如说是修复、再版这个结构的基因。他们最终还是未曾摆脱人

格的依附性。至于遁迹山林、退归自然者,他们在“出世”前多半是积极入世的儒家理想主义者。现实的黑暗,理想的挫折,逼迫他们到老庄哲学中去寻求自己的精神归宿,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转化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而在现实层次中它不得不以“与物俱化”的顺世主义作为补偿^①。“采菊东篱下”的田园诗人实现了对皇权的消极反抗,但“悠然见南山”的忘情生活却颇有乐天知命、得过且过的混世意味。既然如此,又有多少独立人格可言呢?至少是打了一半折扣了。

在宗法一体化结构的社会背景下,传统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其主观上是如何想超越自我,超越环境,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人格上的悲剧,独立与传统士大夫们实在太无缘了。

这种状况到了近代又怎么样呢?

二

封闭性的大一统中国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列强的炮口威胁下被迫开放,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所显露的中西间的差距,惊醒了清末沉睡在自我满足、自我陶醉美梦中的国人。从戊戌变法起,近代中国开始了漫长的向西方认同、改变传统社会格局的艰难历程。封建专制王朝崩溃了,儒家正统地位动摇了,大一统削弱了。这一切,给近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是知识分子职业选择的多元化。1905年,持续了一千多年之久的科举制度的废除象征着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单一发展渠道的时代已告终结。社会分工飞速发展,出版、教育、新闻、科技事业纷纷兴起,大批知识分子成为出版家、教育家、报人、科学家、工程师,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得到了专属自己而非寄人篱下的栖身之地。第二是知识分子信仰选择的多元化。西学如潮水般涌进中国,“物竞天择”说,自由平等说,实验主义,无政府主义,尼采的超人学说,柏格森的生命哲学……令人应接不暇。在这新与旧、中与外百家思潮争鸣激荡的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得活跃、丰富、开放,不再禁锢于一家一说的狭小圈子,而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和需要进行比较和选择,享受到充满魅力的精神自由。可以说,只是到了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人格才

^① 参见周勳:《论庄子的自由观与人生哲学》,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

具备了诞生的社会前提和精神前提,事实上也的确诞生了。

然而,近代中国社会格局的变化是有限的,根深蒂固的东方传统顽固地抗拒着西方世界的同化。透过中华民国那层现代面纱,一种“准大一统”的容貌依稀可辨。仿佛与上述两大变化相抗衡,在“准大一统”下的近代知识分子又面临着两大传统困境:第一是文化结构的半独立性。知识分子所栖身的文化界并未取得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独立身份,始终处于政治强权干涉、插足的阴影笼罩之中。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蔡元培曾仿效法国一度主持设立了大学院这种教育行政制度,期望教育能独立于政治,充分学术化,结果招来国民党内各方面的非议和责难,有人在中央全会上提案要求改设教育部,并诘问蔡:“难道教育独立,必须独立在国民政府之外?”^①仅一年,蔡元培苦心孤诣设置的大学院便夭折流产。不仅教育,其他文化事业亦复如此。如民初的北京新闻事业虽然繁荣,但每家民间报纸都依附于一定的军阀政客集团以求生存,难怪著名新闻记者黄远生要酸楚地感叹,民国以后,吾虽然“立意不做官,不做议员,而遁入于报馆与律师,然其滋味乃正复与官相同”^②。第二是意识形态结构的非自由化。自清王朝倒台,尤其是袁世凯死后,没有一个统治者能够真正统一过中国。但他们都将重建大一统作为自己最高的政治目标。大一统的奥秘首先在于意识形态的一统,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千方百计扼杀多元化的思想局面。如果说北洋军阀因政治更换过频而不及确定“一尊”的话,那么国民党在政权得手后即宣布“三民主义为全国唯一的思想”,“凡是违反三民主义的人,在党治之下是不允许他活动的”^③。“三民主义教育”或“党义教育”成为大中学生的必修课。这种“一个主义”的实现势必要靠刺刀和皮鞭来维持。在近代中国,翻版的“文字狱”屡见不鲜,更甚古代。像报界中的沈荃、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等,都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惨遭杀戮。鲁迅曾深沉地写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④

一方面是取得了一定的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另一方面却享受不到独立于政

① 见周天度:《蔡元培传》,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7页。

② 黄远生:《忏悔录》,《远生遗著》,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29页。

③ 蒋介石1928年7月18日招待北平各界的演讲,见《蒋介石全集》上册第1编,第47、50页。

④ 鲁迅:《突然想到》,《华盖集》,第12页。

治的实际保障;一方面是精神和心灵的自由解放,另一方面却承受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这种种极不和谐的命运遭际,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挑起了紧张的心理冲突。由此,产生了一种欲摆脱屈辱的依附似乎又摆脱不得,渴望人格独立似乎又有所恐惧的矛盾心境。如果说传统知识分子由于自我意识未曾苏醒而无所痛苦,那么近代知识分子一旦被唤起人的尊严、人的自觉和人的自主,又要重新变得麻木不仁、自我克制,这是何等的悲哀、残忍!然而,人格的抉择却现实地摆在面前,容不得你推诿、搪塞,除非自杀;但自杀也是一种抉择。现实的抉择就是这般冷峻:或者是依附于黑暗政治,这不仅意味着生命的苟全,而且还有名有利,荣华富贵,前程似锦;或者是成全人格的独立,这又可能伴随着贫困、孤独、抑郁和血污。

近代知识分子在人格的选择上可分为两个大类五个层面。独立人格一大类中有两层:“特立独行”和“外圆内方”;依附人格一大类有三层:“帮忙奴才”、“帮闲文人”和“游世之魂”。

1. “特立独行”

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壤上所产生的一群极有韧性、极为罕见、绝无媚骨的优异之士,他们在带血腥味的沉闷空气下“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①,使一个“无声的中国”变为“有声的中国”。鲁迅,自然是其中最突出、最杰出的代表。这些特立独行之士都有这样一些性格特征:其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义务感。他们的内心总是充溢着民族、国家和人类的痛苦,这些痛苦使他们时常辗转不安,自觉地背负起历史的十字架。像鲁迅,倘若不是那种深沉到了极点的爱憎煎熬着灵魂,恐怕会活得更长久些。他们又常常无情地自我审视,在良心的洗涤过程中实现精神的升华。如闻一多,原先是超然物外的文学隐士,一旦从学术象牙塔中走出,正视黑暗的现实,就严厉地鞭挞自己:“当鲁迅受苦受害的时候,我们都正在享福。当时我们如果都有鲁迅那样的骨头,哪怕只有一点,中国也不至于这样了。骂过鲁迅或者看不起鲁迅的人,应该好好想想,我们自命清高,实际上是做了帮闲帮凶!”^②

① 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页。

② 王康:《闻一多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27页。

其二,追求“说真话”的精神境界。人世间谎言多矣,但是否说真话,却度量着一个人在多大的程度上能确定自我,摆脱异化。因此,他们都把说真话视作一种至善至美的境界:“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须有了真的声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①说真话是一种责任,一种对良心、对社会的责任,即使为此舍弃生命也在所不惜。章太炎在北京困顿期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②,是何等的快哉!章太炎一生固有众多污点,言论也未必句句精当,但他敢言己之所欲言、人之不敢言,确乎当得起“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③。其三,在死神面前的无畏勇气。统治势力对他们的伎俩终是有限,说到底是一个死字。倘若超越了生的执著,也就无所畏惧。谭嗣同在菜市口刑场疾呼“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超脱,鲁迅去参加杨杏佛葬礼时不带家门钥匙那种“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魄,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痛斥独夫蒋介石,准备接受特务第二颗子弹的凛然,似乎都显现出近代史上的这些“特立独行”之士,大多有置生死于度外,甚至以死为荣、以死为快的大彻大悟。第四,具备蔑视任何外在权威的自主意识和孤军作战的斗争韧性。这恐怕是最根本的。如果说古代的“特立独行”之士并不乏气节的话,那么近人高于古人之处就在于维持了气节的价值,不再重演“愚忠”的悲剧。他们用理性的目光审视一切现存的学说,即使有所皈依也不放弃批判的权利。他们不依附任何“圣明君主”或政治集团,对真理和事业有着自己的理解,因此常常受到同道的误解,以致遭受“背后的枪击”,陷入比死亡更为悲哀的孤独。但他们并不因此而见风使舵,而是在逆境中顽强地孤军奋战,直至将群众慢慢吸引过来。这种真诚坦白、超凡脱俗的自由精神,正是鲁迅所极力推崇的“摩罗”战士最珍贵的品格。

2. “外圆内方”

与“特立独行”者相比,他们也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但有层次高下之别。现实是如此的恐怖,统治者是如此的残忍,人们在屠刀底下不可能没有顾虑,或为生命,或为家庭,或为事业,超越生死毕竟是罕见品质,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谓要求太高。于是近代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逐渐形成了“外

① 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页。

② 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9页。

③ 同上。

圆内方”的政治性格。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1935年,蔡尚思写就《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前辈欧阳予倩谆谆告诫这位青年史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判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以“纯研究的态度”作进攻的“挡箭垛”,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予倩叹谓:“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①不过,这些知识分子在方式方法、局部问题上可以委婉圆滑,有所妥协,而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心的原则立场上却毫不含糊,旗帜鲜明。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之一黄炎培即是典型。“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他亲笔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第三方面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沼时,黄却不为所动,答以“我不能自毁人格”^②,维护了政治气节。“外圆内方”是一微妙、高超的处世艺术,它是近代独立人格在东方专制国度里可喜而又可悲的变形。它维护了人格的独立,保全了人才的精华,也多少损伤了自由的尊严,使人格主体为把握正义和生存的平衡艰难地度量着。1947年底,在国民党的淫威下,黄炎培代表民盟被迫与当局达成自动解散民盟的协议。尽管此举避免了广大盟员不必要的流血牺牲,但黄良心上的失落感却使他极其痛苦不安,吟出“黄花心事有谁知,傲尽风霜两鬓丝”^③的苦句。“外圆内方”者的内心是分裂的,他们最大的困惑和苦痛就是如何将双重的性格自觉地在现实中加以弥合。为了同时维护个体的生存和人格的独立,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作出了西方人所无法理解的精神牺牲和无从体味的灵魂煎熬!

3. “帮忙奴才”

传统中国是一官国,权力意味着一切。虽然五四运动时期“劳工神圣”的口号流行一时^④,但“读书做官”的传统价值仍在相当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头脑中被奉为圭臬。权力的诱惑力实在太强了,某些人无法不趋之若鹜。每年留学生归国,总有一批海外学子源源补充于庞大的官僚队伍。有些颇有声望的大学教授、学者名

① 见《蔡尚思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1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51页。

② 1946年7月27日黄炎培日记。

③ 黄炎培:《红桑集·玄武湖秋感三绝》。

④ 五四时期的“劳工”一词,泛指包括士农工商在内的一切体力和脑力劳动者。